

鲁迅的智与谋

■中教



鲁迅一生都在战斗，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也郑重地表态：“让他们怨恨去，我也一个都不宽恕。”只是他的战斗是充满智慧的。在日本留学时，他积极参加反清斗争。一次革命党委派他回国刺杀清政府官员，他说：我可以立即动身的，现在只想了解一下，如果我死了，剩下老母，那时该如何替我照料呢？那人一看鲁迅有顾虑，就就算了。

这就是鲁迅，从年轻时起，就有着清醒的头脑和长远的目光，他不提倡蛮干，也决不蛮干。

上世纪30年代，周建人把自己看的一些马列著作摆在书架上，鲁迅就严肃地说：“你怎么把这些书放在家里呢？把这些书放在家里就是公开向敌人说我是左派，这是很危险的。”

鲁迅的很多马列书，从不乱放，而是藏在离他住处不远的上海大陆新村9号。为了迷惑敌人，他特意把一块写着日本职员“镰田诚一”名字的木牌，挂在门口。

为了更持久地战斗，他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，光1931年到1936年，就用过80多个笔名。从藏书、换笔名这样的小事上，恰恰可以看出鲁迅是很讲究策略的。

1930年2月自由运动开大会，鲁迅积极参与组建“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”，并发表演说。国民党政府通缉“堕落文人鲁迅”，有人劝他发表声明，退出组织。可是，鲁迅却坚定地说：“我用硬功对付，绝不声明……”鲁迅对通缉漠然置之。在革命的紧要关头，在危险的时候，他挺身而出！

1933年6月20日，鲁迅冒着生命危险，从容参加杨杏佛人殓活动，他出门有意不带钥匙，以示视死如归、决不退却的意志。鲁迅送殓归来，怀着深沉的悲愤写下一首诗：“岂有豪情似旧时，花开花落两由之。何期泪洒江南雨，又为斯民哭健儿。”由此可看出鲁迅的伟大情怀。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，鲁迅可谓“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”。

这就是革命家鲁迅，他坚持战斗，但反对盲目战斗，他给友人的信中曾说：“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，若专一冲锋，而反遭覆灭，乃无谋之勇，非真勇也。”他的战斗精神和战斗智慧，留给我们的是一笔宝贵的财富！

周恩来策划铲除出卖彭湃的叛徒

■廉望

1929年11月11日深夜，在上海市霞飞路附近一处宅院的门前，随着“砰！砰！砰！”几声枪响，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当场命归西天。当大批法国巡捕和侦探赶到时，人群早已散去，只剩下包括穿黑色西装者在内的几具尸体横躺在了一片血泊中。

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，并且部署策划得如此周密，实施刺杀如此干净利落与准确无误，此消息立即轰动了全上海。各报连日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，有的报纸甚至称之为“东方第一谋杀案”。

英雄就义 周恩来亲令“锄奸”

那个被打死的穿黑色西装的人，名叫白鑫，湖南常德人，黄埔四期生，后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27年参加了“八一南昌起义”，1929年初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。

1929年8月23日，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，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开会。24日下午，会议按时进行。周恩来因临时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，就请假未到会。

然而，会议还在进行中，国民党特务包围了会场，他们冲进屋内按手中拿的名单抓人。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，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、邢士贞等人和彭湃一起被捕。

事情发生后，周恩来和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，党内出了叛徒。这叛徒正是白

鑫！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处于腥风血雨之中，白鑫早已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破胆，他通过在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，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。为了邀功请赏，他提出帮助国民党抓到周恩来、彭湃等共产党要人。于是范争波与白鑫定计，借中共中央军委开会时来个一网打尽。

陈赓通过在敌人内部的我党特工杨登瀛，很快知道了彭湃等人关押的地点，并且得知，蒋介石已下令枪决彭湃等人。周恩来等人制定了一个营救方案，但是敌人早已经做好了防劫法场的准备，敌我力量悬殊很大，陈赓等人只好忍痛放弃原定的计划。

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，被毛泽东称为“中国农民运动大王”，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。周恩来悲愤万分，指示陈赓，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踪，定杀不赦！

白鑫明白自己的处境，就当起了缩头乌龟。因此，地下党组织四处打探，也一直没有弄到白鑫的讯息。

1929年9月下旬，白鑫带着国民党特务突然到上海达生医院找柯达文大夫看病。原来，白鑫整天处于极度惊恐之中，吓出了头疼的毛病。而柯达文是中共地下党员柯麟的化名。他通过几次给白鑫看病的机会，摸清了霞飞路（今淮海中路）和全坊四弄43号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。于是，柯达文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做了汇报。

深入虎穴
秘密特工“义结”叛徒

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后，陈赓和周恩来商议，决定安排杨登瀛打进敌人内部去，盯准白鑫。杨登瀛原名鲍君甫，自幼在日本生活与求学，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后，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把他视为知己，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。到上海不久，杨登瀛就成为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。

杨登瀛很快弄清和全坊四弄43号是大特务范争波的公馆。杨登瀛就找了个事由登门到范公馆拜访。这位陈立夫跟前的大红人亲自登门，范争波自然不敢怠慢，还将白鑫介绍给他认识。此后，杨登瀛多次到范公馆找白鑫，就这样与白鑫交上了“朋友”。

里应外合 “锄奸队”深夜惩奸

白鑫做了亏心事一直寝食难安，虽然不断找柯达文诊治，但头疼的毛病总不见痊愈。在白鑫的一再请求下，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白鑫逃亡意大利。从杨登瀛处获知这一重要情报后，周恩来指示，一定要弄清白鑫出逃的准确时间、船次，并指



示陈赓组织“锄奸”队员，坚决除掉叛徒，绝不能让他逃往国外。

1929年11月11日深夜，负责伏击叛徒的“锄奸”队员按计划分别潜入和全坊。11时许，43号院后门闪出7个人：白鑫夫妇、范争波兄弟和3个“护驾”特务。

他们刚走几步，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：“白鑫，哪里走！”接着就是“砰，砰”枪声响起……

战斗很快结束。白鑫、范争波弟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，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。事件发生后，国民党方面下令一定要查清事实真相，但他们费了老大劲也没有查出个子丑寅卯，最后只好不了了之。

民国报纸那些绝妙标题

■继兴



“余汉无谋 吴铁失城 曾养离甫”。

1942年冬，《大公报》派遣记者张高峰到中原地区采访。他从重庆经西安到达洛阳，目睹灾民流离失所、遍地饿殍的惨景。1943年1月17日，他向《大公报》重庆馆寄出《饥饿的河南》的长篇通讯。总编辑王芸生看后，改题为《豫灾实录》发表，并提笔写了《看重庆念中原》的社评。当晚，国民党当局限令《大公报》停刊三天，以示“惩戒”。三天后，《大公报》发行量由6万份增至10万份。

1947年，金元券大贬值，民不聊生，工薪阶层苦不堪言。武汉《大刚报》曾在头版头条刊出大字标题：

公教人员不是东西(主)
是东西也应当涨价！(副)

1947年5月8日，《文汇报》把国民党政府查禁《窃国大盗袁世凯》一书、四川省府购买《伟大的蒋主席》一书配发给公职人员

这两条消息合在一起编发，加了这样的标题：“《袁世凯》要查禁《蒋主席》必须读”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湘鄂的国民党报纸常刊登贺龙被活捉枪毙的消息。一天，某报又受命刊登这一“新闻”，原标题为“匪首贺龙昨被活捉枪毙”。结果，出报时，变成“匪首贺龙昨又被活捉枪毙”。

国统区的一家报纸，对蒋介石频繁打内战深感不满，刊登了题为《战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》的文章，竟一周内被停刊两次。另一家报纸对此愤愤不平，特意发消息以声援同行：“报而时停之，不亦乐乎！”

在标题制作方面最有成就的当属老报人张友鸾。一次，南京连日阴雨，张友鸾听完气象预报，提笔写出新闻标题：“潇潇雨，犹未歇，说不定，落一月。”《新民报》要刊发一则讽刺国民党官员生活腐化的新闻，张友鸾拟标题为“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”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群众要求政府抗日，他拟标题为：“国府门前钟声鸣，声声请出兵”。政府为士兵募集冬衣，他题为：“西风紧，战袍单，征人身上寒”。而报道贫富差距，他又取标题叫：“难民不能求一饱，银耳参茸大畅销”。1943年，成都各大、中学校毕业生大都找不到工作，青年学子们怨声载道。《新民报》登载了四川大学通讯员写的一则消息，说该校厕所管道堵塞，不能使用。张友鸾制作了耐人寻味的标题：“川大出路成问题”。川大校长系国民党省党部主任黄季陆，阅报大怒，但又无可奈何。

古代科举也有“加分”

■晓巧

科举时的清代，除了三年一考的乡试、会试正科，还沿用了宋明以来的所谓“恩科”。尽管科举考试法令甚严，对科场舞弊的处罚也极其严格，常有砍头株连的记载。但清朝皇帝为了笼络大臣，还是公开采取了一些照顾大臣子弟的科举措施。

按科场定例：现任的京官三品以上，外任官员布政使、按察使以上，武官提督、总兵以上，他们的子孙、同胞兄弟，以及同胞兄弟之子，参加乡试的称为“官生”，卷子另外编为“官卷”。“官生”的录取是“提前批”的，每二十名“官生”取一名，这比其他人考取举人要容易得多了。

在道光朝以前，礼部会试和顺天乡试的主考官，他们的家人和亲戚如果参加考试，按照规定他们都回避了批阅试卷这个环节。然而，这并不吃亏，这些官员的家人和亲戚的试卷，会被另外封起来派专人阅卷，择优录取。

上述的照顾对象，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参加统一考试的，但还有一些人，明明榜上无名，照样做举人。雍正六年，乡试后，一日雍正皇帝心情很好，通知手下大学士、尚书、侍郎等高级官僚，谁家里有没录取、年龄在二十岁以上的子弟，准许每位大臣各举一个，开出名单送内阁审定。大学士蒋廷锡等众大臣欣喜万分，列出蒋溥等十二子弟的名字呈上去。后来，这十二个人都被皇帝特赐为“举人”。

这些以科场加恩大臣子弟的措施，让大臣们更加感戴皇恩尽忠效命。然而，这也把“为国选士”的“国事”，实际上变成了皇家的私人“家事”。